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论略

左鹏军

【内容提要】 容闳德育与智育并重的教育思想,是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固有的道德思想融会而成。由理论走向实践是容闳追求的目标,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他提出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基础。容闳受过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较少封建观念的束缚,赋予他政治思想不断进取、紧贴时代的品格。容闳的思想虽几经变迁,但其根本点是始终如一的,就是:执著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使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传播,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使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

容闳(1828—1912年),字达萌,号莼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1828年11月17日生。少年家贫。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旋随校迁香港就读。1847年随该校校长赛缪尔·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赴美国,入麻省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为中国最早的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次年回国,先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并曾一度经商。1860年曾到南京考察太平天国,并提出建议,未被采纳。1863年入曾国藩幕,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购买机器。多次提出组织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1872—1875年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任留学事务所监督。1875年兼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1895年返回后,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方案。1898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政变发生,逃出北京。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被推为“中国国会”会长,旋因清廷通缉逃至香港、台湾。1902年再度赴美。1910年曾在美国与孙中山商谈,表示支持革命。1912年4月2日卒于美国寓所,葬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城。著有英文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名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纽约出版。1915年徐凤石、恽铁樵将其译为中文,

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使用《西学东渐记》之名,后遂一直沿用。

一、教育思想:从理论到实践

容闳从小到大,从入西塾到毕业于耶鲁大学,受到的是西方近代的新教育,自不同于中国的旧式教育。但是,他在以英文为主要工具的教育环境中,也不放弃学习中文,这除了是为自己前途着想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处处不忘救助自己的祖国。因此,他的教育思想,虽然受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强烈影响,但是却颇能有所选择,不曾忘记他面对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说:

大教育家阿那博士(Dr. Arnold)之言曰: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鸭鸥耳,曷足贵哉!(《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7页。下引该书只注明页码)

这种将道德与学问知识合而为一的观念，可说是德育与智育并重，即是说，为学与做人双管齐下，把学生训练成既有优美的品格，也有真实丰富的学识，这才是教育的理想目的。

容闳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自己是完整地受过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人，所以，他深深地自觉到责任的重大，他有意识地把这种新教育观念的种子，在中国播种并且发扬光大。正如他所说：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情，殆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第22页）

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愈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第23页）

容闳从美国学成归国，一方面有奉养年迈贫病的母亲的心愿，另一方面更有为救助祖国而努力的宏愿。他深知他所受到的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是稀有的至宝。他回到母亲的身边，对老人家说道：

此（按指毕业文凭）非可以得奖金者。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为易。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

之效用，较金钱为大。儿今既以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耶路大学，今后吾母即为数万人中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此乃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儿此后在世一日，必侍奉吾母，俾母得安享幸福，不使少有缺乏也。（第28页）

容闳的母亲也认识到，她的儿子“虽受外国教育，固未失其中国固有之道德，仍能尽孝于亲也”（第29页）。

可以说，容闳的教育思想，是德育与智育并重，是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的扩大，同时也有中国固有的道德思想等所融会而成。由理论走向实践是容闳追求的目标，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他提出教育计划的基础。这位经过欧风美雨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打算以此来救助中国，使之“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成为少年新中国。于是，回国以后，容闳开始提出并实践他的教育计划，实现他多年理想的追求历程。

容闳到南京太平军中考察，并向于王洪仁玕提出了七项建议，其中有关教育者有四项，即：

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刀为训；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参第56—57页）

并且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第57页）可见容闳为太平军尽力的诚意。无奈太平天国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容闳也只得离开，另寻出路。

入曾国藩幕之后，容闳得到了曾氏的赏识，也得到了一展怀抱的机会，事业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容闳在建议成立江南制造局之后，积极鼓吹翻译西学著作，以便更充分地了解西方的科技文化，他还亲自动手，翻译了哥尔顿所著的《地文学》（Colton's Geography）和派森的《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同时，容闳也积极从事教育人才的工作。他曾建议在机器厂之旁设立一所兵工学校，建立培养机械工程人才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他极为重视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是要使

外国先进的工业技术、教育成就在中国扎根，使中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与愚昧。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现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第85页）

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遂跃跃欲试。（第85页）

接着，容闳向老友丁日昌提出教育计划，得到丁氏的赞许，于是容闳将计划撰为条陈四则，由丁日昌上之清廷，其第一、三、四条略谓：

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参第86—87页）

容闳说：“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第88页）这让容闳颇费心思的第二条即是：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频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批、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

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款数成以充之。（第86—87页）

从教育计划的周详、严整，可见这是容闳在他教育思想指导下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可见他的远见卓识。他自信地认为：“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第88页）他的教育计划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前途着想，表现了他的爱国深情。这一计划由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联名入奏。容闳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第90页）清廷终于批准了容闳的教育计划，“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事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第91页）对此满怀信心。

经过容闳的不懈努力，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终于在1872年渡太平洋赴美国学习，此后的1873—1875三年里，每年分派30人赴美，原定十五年学成回国，容闳任中国在美设立的留学事务所监督。可是由于受到坚持闭关自守、反对学习外国的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与攻击，至1881年，这些留学生又全部被撤回了。容闳殚精竭虑竭诚为之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在勉力推行一段过后，也终于完全破产了，容闳的心血付之东流。尽管如此，这些留学生后来还是为中国的富强作出了贡献，如首批赴美学生中就出现了詹天佑这样著名铁路工程师。还出现了蔡廷干、梁敦彦、唐绍仪这样的著名人物。这也算是对容闳的告慰吧。

二、政治思想：从洋务、维新到革命

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回到祖国，看到满目疮痍的现实，使他对太平天国非常关注，于是到南京进行政治考察。他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的：“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第50页）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七项建议，除上文所述关于教育者四项外，其他三项是：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第56—57页）

可见，容闳的七项建议，都是建设现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方针大计，是他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结果，表现了一个身受西方近代教育和文明培育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远见。但是，容闳还是离开了南京，这一则因为太平天国没有接受他满腔热情提出的建议，二则因为他看到的某些情形使他觉得太平天国未必可以“胜任创造政府以代满洲”。他曾加以评论说：“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如石人之有二面”（第61页）：一面是革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一面是游民分子大量加入和原始宗教信仰造成的落后性和破坏性。因此他总的看法是：

简而言之，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推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觉悟，而有新国家之思想。（第62页）

容闳寄希望于太平军既已失望，转而找到了曾国藩，希望通过曾氏实现自己的“西学东渐”计划。他首先建议成立江南制造局，这是容闳构想的中国第一个机器厂。他说：

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须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第75页）。

可以说，容闳的这一思想，是想从根本上建立中国工业的基础，振兴民族工业，具有非常远大的眼光。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容闳接受委任，赴美国购办机器，运回上海。中国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

机器制造总局终于建成，容闳的计划部分地实现。

但是，由于清廷的不思振作，愚昧顽固，容闳等有识见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毕竟难以完全改变眼前的贫瘠蛮荒。清政府撤回赴美学生的行为，引发容闳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前途：

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第110页）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容闳以强烈的震动，也促使他思想发生一次大变化。他说：

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第116页）

他的意思非常明显，如果中国要重振昔日的雄风，重现昔日的光辉，则要有一完全的新政策，从根本上改革现有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这样才有远大的希望。

容闳此时的思想已不限于洋务自强的范畴，而是与维新派的主张若合符契。事实也确是如此，容闳走上了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同谋求维新变法的道路。他对光绪皇帝予以高度评价：

平心论之，光绪实非痴，亦非狂。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其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天之诞生光绪于中国，殆特命之为中国革新之先导，故其举措迥异常人，洵伟人也。（第122页）

维新思潮方兴未艾的时候，容闳也深受鼓舞，他认为中国“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积极地投身到变法活动之中去。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吴相湘《容闳欣见民国肇建》,《民国百人传》(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予睹此状,乃决意留居北京,以观其究竟。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第122页)

政变发生后,容闳当然名列黑籍:

予以素表同情于维新党,寓所又有会议场之目,故亦犯隐匿党人之嫌,不得不迁徙以逃生。乃出北京,赴上海,托迹租界中。(第122页)

到上海之后,他继续从事维新变法活动,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张园“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因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台湾。在台湾,清政府又行文给日本总督,请日本当局把他捕送中国。从清政府的一再通缉中,可见容闳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决心,亦可见他在这次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维新变法运动既已失败,清政府又屡次通缉,容闳只得再度赴美避难,最后竟埋骨他乡。身居美国的容闳,仍然不曾减少对祖国命运前途的关注。由主张维新进而为支持革命,容闳走完了他政治思想的最后一段历程。1900年9月1日,容闳离开上海的时候,恰好与孙中山同轮,二人相识,此后便时有联系。容闳移居美国后,与中外人士多有接触,他尤其关注着孙中山从事的民主革命运动,并且尽力予以支持。1909年左右,容闳与孙中山通信频繁,这一年的12月22日,容闳邀请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到达纽约。1910年2月16日,容闳向孙中山提出建议:

(1)自银行贷借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元作活动基金;(2)成立一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之人以管理占领之城市;(3)任用一有能力之人统率军队;(4)组训海军。

并且尽力促使美国人士认识了解孙中山,以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可以说,容闳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运动尽了一份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武昌起义胜利,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地致信容闳,热情邀请他回国,并且寄了一张照片给他,信中说:“丁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抱之目的将达之际,遑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鼓舞。”“民国建设,在在需才!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先生所赐矣。”(同上)从孙中山推崇备至、企待尤殷的信中,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厚,容闳对孙中山曾予以多么有力的支持。

然而,当大洋彼岸的容闳收到孙中山赠给他的照片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这位85岁的老人已经昏迷不醒,旋即与世长辞。这位始终依恋故土、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却屡遭挫折,难展怀抱,最后不得不远托异国,直至埋骨他乡,这远非容闳一人之不幸和悲哀。

容闳因为受一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较少因袭传统,较少封建观念的束缚,因此,赋予他政治思想以不断进取、紧贴时代的品格,经历了由洋务、维新到革命的发展过程。他的政治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他的政治思想虽几经变迁,却并不矛盾,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点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至死不渝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的驱动下,执著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使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传播,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使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作者简介】 左鹏军,男,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责任编辑 李景文)